

杨先武◆著

# 语文教育

# 路

# 在何方

YUWEN JIAOYU LUZAIHEFANG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杨先武◆著

# 语文教育



# 在何方

YUWEN JIAOYU LUZAIHE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内容提要

全书汇集了作者从教以来在语文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中的主要成果,和同类著作相比,本书在反思与批判上尤显鲜明。有些文章在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展开过讨论,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1)怀疑与批判。本部分主要对我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和语文名师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质疑,也有对当前语文教育存在弊端的批判。(2)探索与追寻。本部分记录了作者在语文教育改革中的探索。包括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等。

责任编辑:蔡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教育路在何方/杨先武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30-1277-5

I. ①语… II. ①杨…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5538号

## 语文教育路在何方

杨先武 著

---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4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字 数: 228千字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mailto: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caihong@cnipr.com](mailto:caihong@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4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130-1277-5/G·488 (4155)

---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教师，同样要敢于质疑 熊丙奇/1

在怀疑与批判中探寻语文教育的真谛（自序）/4

## 怀疑与批判

别为魏书生创造神话/27

一位改革家与新课改的对抗/29

钱梦龙先生要招什么“魂”/32

语文教学“魂”归何处

——回应钱梦龙先生的“答客问”/36

【附】部分网友的评论/41

从程红兵的“位移”看批判精神的失落/50

批评，要建立在崇敬的基础上吗

——与朱永新先生商榷/53

从“危言耸听”到“别有用心”

——评《中学语文教学》庆祝创刊20周年座谈纪要/55

为钱理群教授一辩/58

“三老”语文教育“工具论”评析/62

考纲不变，课改难行/74

既要看“教什么”，也要看“怎么教”

——与王荣生先生商榷/78

从“板块式”教学看以“教”为中心

——以《荷叶 母亲》课堂实录为例/83

品味语言不应只注重华美

——听荆州市青年语文教师竞赛课有感/91

岂能如此“玩”诗歌

——评程少堂《你是我的同类》课堂实录/93

脱离文本的“解读”，缺少对话的“生成”

——评于国祥《斑羚飞渡》课堂实录/96

是指导还是误导/101

从一篇满分作文看高考作文的错误导向/103

高考作文提示应引导发散思维/107

别把编造当虚构/110

小说都是虚构的吗/115

杨朔散文创作的错误倾向及其对作文教学的负面影响/118

给语言大师挑挑刺/123

## 探索与追寻

此间有“争议”欲辩已忘言

——作文《逮老鼠》引出的话题/129

【附】《逮老鼠》座谈纪要/137

语文教学中多种质疑方式的运用/142

喜听学生“唱反调”/147

新课程需要怎样的教学设计/152

让思想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从一篇“另类”作文说开去/155

假如这件事发生在中国

——《走一步，再走一步》教学手记/160

《道士塔》引起的争论/163

让课堂教学中多发生一些“意外”/166

“工具”与“人文”，本是同根生

——“两性”统一例谈/169

|                   |  |
|-------------------|--|
| 《台阶》意蕴新探/174      |  |
| 《三峡》研读与备教/176     |  |
| 《记承天寺夜游》研读与备教/179 |  |
| 《拣麦穗》课堂实录/182     |  |
| 《雨说》课堂实录及点评/190   |  |
| 作文评改：让学生享有主动权     |  |
| ——记一堂作文评改课/198    |  |
| 一堂反常规的试卷讲评课/204   |  |
| 儿子的获奖作文/210       |  |
| 后记/215            |  |

# 教师，同样要敢于质疑

我与杨先武先生本不相识。他通过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得知我的联系方式，给我发来了他的书稿，并在邮件中说到一些出版机构对出版这本专著提出的担忧——涉及对一些教育权威人物的批评，这反而引起了我的阅读的兴趣。

杨先生在这本书中对一些教育“权威人物”的批评，其实都在学术讨论范畴，没有无聊的人身攻击，而是就某个教育观念发表“自成一体”的“个人学说”，可以开阔大家的思维空间。这种敢于质疑的精神，在当前的教育中是十分缺乏的，也显得尤为可贵。

近年来，教育界围绕回答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没有少开座谈会、少发文章，但总体看来，大多人云亦云。尤其令人感慨的是，不少参与讨论者认为，要培养创新人才，就必须鼓励学生敢于质疑，要创造相应的环境。可是，就连这些讨论者本人，包括大学领导、两院院士、专家教授们，转过身来，都忘记了何为质疑——自己既不会质疑“学术权威”，更不允许有人来质疑自己、挑战自己的权威地位。

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景象，其结果必然是每个个体都逐渐失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识和能力，最终不会思考，更没有所谓的创新，要培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之人才，无异缘木求鱼。这种现象值得所有教育者反思。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每个教师首先得学会质疑、敢于质疑，这才可能像杨先生一样，为学生做出质疑的示范，并为他们营造敢于质疑的教学空间。

我国的基础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的最大差别，不在于学科体系是否完善，教师学历层次的高低，而在于是否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探究精神。我们的教育，强调学生对学校、教师的服从，学校、教师代替学生做课程的选择、人生的选择，而不是把学习的选择权交给学生；我们的教育，强

调学生对某一个观点的背记，背对了得分，背错了扣分，哪怕是写作，也不能出现“观点错误”，而不是引导学生学会思考，自由表达自己经思考得到的观点，更不允许这一观点听上去是“离经叛道”的；我们的教育，只为所有学生提供了一个成才通道，这就是高分者可以上好的学校、获得好的工作，而低分者，就被教育分离为“失败者”。这种单一的成才模式，让学生接受必须“服从”、“顺从”的现实，被分数和利益控制，甘心做分数的奴隶。

这不仅体现在对学生的教学中，教育研究、教师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有“百家争鸣”的口号在，可对于一些教育话题，早已约定“观念先行”，如果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往往会被视为异类，被体制边缘，甚至被一棍子打死。这是违背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的，延续这样的局面，我国的教育研究水平会日益走低，而教师也会失去对教育教学的独立思考，从而让教育教学失去灵魂。大家面对教育问题，也不敢正视；明明已是教改失败，却说成是极其成功。

所以，我虽不赞成杨先生的某些观点，但我支持杨先生敢于质疑、敢于表达的精神。其实，包括我自己所发表的很多观点，也未必都得到他人的赞同，但这些观点，都是我自己深入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只是为大家多提供一个视角。如果所有人都能针对教育问题，独立、自主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就拓宽了教育话语空间，能形成更好的沟通，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发现事物的本质，并聚集大家的智慧，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我国当前正在推进面向 2020 年的国家教改，这一轮教改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公众，尤其是教师、学生群体对改革的参与。如果能有更多的第一线教师，像杨先生这样，积极表达自己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就会形成更强大的推动教改的力量。

愿以此与所有教师共勉。

熊丙奇

2012 年 3 月 19 日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和教育评论家，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其

著作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直面就业》、《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等20种30余版次。2009年被中央教育电视台、腾讯网评为“年度致敬之教育时评家”。2010年4月8日，作为11位代表之一，应邀参加教育部举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座谈会。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 在怀疑与批判中探寻语文教育的真谛（自序）

我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老三届”的特殊经历给我留下了太多的沉重的记忆，在30余年的从教生涯中，我一直在同旧教育观念的碰撞中踽踽前行。就是在头上已绕着一道特级教师光环的今天，我依然感到羁绊重重，步履艰辛。但我一刻也未曾放下批判的武器，我不停地在迷茫中探寻。记得二十年前有位老师曾以一句名言相赠：“是金子总会发光。”我虽然算不上一块金子，但可以无愧地说，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脚印。

## 祸起犯上，“发配”穷乡

教师，被称为“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但要真正热爱这个职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走上三尺讲台前，就曾发誓不当教师。这并不是因为睥睨其身份和地位，或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而是因为我对文学的爱好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我从小就羡慕作家和艺术家，对文学和艺术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因此，尽管我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教师，但我却从未把教师列为自己未来职业的选项。幸运的是，我姐姐曾在一所师范学校当过几年图书管理员，我便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从此，我对文学更是一往情深。

我的文艺天赋在中学时代便开始显露。上初中时，我就将一部中篇小说改编成四幕歌剧，在校内演出大获成功。中考时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重点中学沙市三中，很快便在文艺创作上崭露头角，并被市文化馆吸收为业余作者培训班成员，进行重点培养。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荡碎了我的大学梦，接着，我又被卷入上山

下乡的洪流。我和几个要好的“老三届”自由组合，插队到原江陵县一个偏僻的湖村。那里虽然落后，但在我看来，倒是一个深入生活、积累文学素材的好地方。我的文艺特长让我少受了许多体力劳动之苦，大队通讯组、公社宣传队、工地广播站……写写画画，唱唱跳跳，也能享有几分轻闲。我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搞起了业余文艺创作。散文、诗歌、歌词、曲艺等，刚开始发表在县文化馆主办的《江陵文艺》上，以后又不断见诸省内报刊（老实说，这些“作品”现在已羞于启齿）。文学创作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但每当看到同来的知青先后被招进工厂，而我却因家庭问题的影响（父亲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哥哥曾因替右派分子鸣不平而被打成反革命）一直留在农村，直至成为孤家寡人，心中不由笼上一层阴云。

正当我感到万念俱灰的时候，大队小学校长段昌期找到了我。出于对我的处境的同情，也因为学校缺乏师资，他动员我到大队小学任教。尽管我曾发誓一辈子不拿粉笔，但眼前的窘境已容不得我充硬汉。我二话没说，当即收拾行装，跟随校长来到大队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后来我才得知，大队党支部在讨论是否让我当民办教师的问题时曾发生过争论，有人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当老师。但校长凭着烈士子弟的身份据理力争，终于让党支部开了绿灯。

在大队小学，我的知识和特长都有了用武之地。虽然处在“知识无用”的年代，但校长却不理那一套，对课堂教学抓得很紧，学校的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我除了任教五年级数学，还包揽了全校的音乐课。学校地处荒野，每到周末，其他老师都回到各自家中，剩下我一人留守校园。夜间，四周万籁俱寂，唯有孤灯相伴。一头扎进书中，似乎已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和恐惧。可以说，担任民办教师，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看法渐渐有所改变，我和学生之间也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虽然我在此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这段宝贵的经历使我在1976年正式走上教育岗位后很快便进入了角色。

1974年初夏，幸运之神终于降临，我创作的一首歌词经省内一位音乐家谱曲，被当时唯一获准刊登音乐作品的《战地新歌》选用（当年湖北省仅此一首被选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教唱歌曲播出，全国多家报纸发表了评论。于是，我一下子由“黑五类子弟”变成了“江陵县的骄傲”，并作为荆州

地区唯一的业余作者代表出席了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也就在这一年的高校（含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我没费吹灰之力，就被推荐到江陵县的最高学府——江陵师范学习（事后才得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来为我留过一个指标，但因县里“不放”而被另一位知青取代）。县文化馆一位副馆长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并向我承诺：进师范只是为了改变我的身份，一年后就会让我提前毕业，安排到文化馆工作。

然而不到一年，我的命运就发生了逆转。我的不安分使我无法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培养温顺的羔羊表示沉默。我在许多场合公开批评校领导的做法，这无疑使学校领导十分难堪，他们对我的“犯上作乱”难以容忍。理所当然，我的提前分配搁浅了。

1976年春，我接到省文化局文艺创作室通知，赴省城参加歌词创作学习班。其时我被抽调到县文教局进行戏曲创作攻关，我向校领导和戏曲攻关组组长请假后便出发了。没想到这让文教局某负责人大为恼火，因为我在离校前既未向他请示，更未得到他的批准。于是我在省里的学习班尚未结束，一封公函便发往省文化局，称我未经批准便擅自离校。省创作室领导为了“顾全大局”，只好让我回校。这对我来说，算是又闯了一次大祸。

转眼到了毕业分配之际，此时已有省、地、县文化部门的多家单位分别为我的分配与县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进行协商。但鉴于我在学习期间的“恶劣表现”，这几家单位全都碰壁而归（县文化馆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正式公布结果的前三天，一位参与毕业生分配的副校长（他在我与校方的冲突中一直保持中立）找我谈话，向我泄露了一个秘密：学校原本打算将我分配到江陵县与监利县交界的沙岗区（当时的区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但因距县城较近的观音垵区急需我这样的“人才”，多次跟县里打招呼，他便帮我开了个“后门”。我那时的心情只能用“感激涕零”来形容。人的欲念和愿望就是这样充满变数。如同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不会向往锦衣玉食一样，此时的我只要不被惩罚到江陵的“西伯利亚”，就已心满意足。

到观音垵区报到那天，区文教干事热情地接待了我，希望我“好好锻炼”。我满以为这位干事既然将我作为“人才”招至麾下，一定会委以重任，没想到吃过午饭，他派了一辆专车——牛拉的，把我送到了全区最偏远的一所公社中学。这所学校地处江陵与荆门交界的长湖之滨，学校规模很小，六个教

学班，不到20个老师。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如同面对一个虽不遂心却又不得不交下去的恋人。我想，这大概是让我接受“锻炼”的地方，我不会在此待得太久。但它已然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港湾，我的生命之舟将会从这里起锚，开始新的航程。

## 力扛大梁 初露锋芒

这里的领导和老师似乎已经知道了我分配到此处的“内幕”，我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了惋惜和同情。校领导对我很关照，没安排我当班主任，让我代高一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全校仅两个高中班），并兼任全校的音乐课。这正合我的意愿。

甫到学校，就听有人私下议论：“会搞创作不一定会教学生。”但我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这也许是因为我有过担任民办教师的经历，对教学并不陌生；也许是因为我的普通话说得比较标准，不像其他老师讲课都用地道的方音；也许是因为我有舞台表演的经历，上课时富有激情，颇能吸引学生。不到一学期，我就承担了全区范围内的一堂公开课，获得听课教师的交口称赞。我在此只工作了一年半，就被调往区直学校——观音垱中学。

我至今仍感激观音垱中学的那位老校长姚家林，是他对我的器重使我很快便崭露头角。刚进校时因中途接班，他让我试代高二年级一个普通班的语文（当时的高中学段为两年制），一学期后，他便把高二文科重点班的语文和地理两大学科的重任交给了我。而那一年正是高等院校首次招收应届毕业生，对于一校之长来说，这种任用与其说是大胆，毋宁说是冒险。

没有什么比信任更能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为了对得起校长的信任，我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虽然我毫无执教高中毕业班的经验，也从未学过中学语文教学法，但我有自学语文的切身体验，我想只要把自己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就一定会收到实效。

出于对文学的偏爱，我的课堂教学总是充盈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尽管当时在我的头脑中并没有“文学教育”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学语文主要是读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中有学不完的语文知识，语文的无穷魅力也主要显现

在文学作品之中。对于那些语言干瘪且充满说教味的议论文，我一般不下多大的工夫，因为它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我给学生补充了大量取自课外的文学材料，这便使我的课堂教学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先声的“伤痕文学”在文坛上崛起，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它们虽不能与我曾经读过的中外名著比肩，但那时确有一种从干涸的荒漠来到万木葳蕤、百鸟啁啾的大花园之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要让学生分享这份愉悦。于是，每有让我感动的作品，我就会向学生介绍。我曾连续利用两个星期的读报时间给学生朗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动情之处，我读得泪水潸潸，教室里也响起一片抽泣声。

在我的影响下，学生们对文学的兴趣大增。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把自己的藏书倾箱倒篋地借给他们阅读。我还组织学生订阅了 20 来种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品》、《长江文艺》、《雨花》、《延河》……每到一期，我都先睹为快，然后向学生推介其中的优秀篇目。

那时候，还没有十分惨烈的高考竞争，也没有多如牛毛的复习资料，这无疑使我的语文教学显得较为轻松，学生们也在自由的天地里沐浴着文学的春风。第一年高考，我就喜获丰收，全县达到文科录取分数线的不超过 10 人，而我所代的文科班就有 2 人，我的一个得意门生顺利考入本科院校。在连续两年品尝高考胜果后，校领导为了改变理科生偏科的状况，决定让我改教理科重点班语文，同时兼任文科班地理。我很快便让理科班的学生爱上了语文，该科成绩也稳步上升。尤其是这个班上的头号“种子”李新人，竟然迷上了文学书籍，常来找我借阅中外名著，诸如《儒林外史》、《红与黑》、《复活》、《高老头》、《忏悔录》、《艺海拾贝》……看了一本又一本。尽管代物理课的班主任对此颇为不满，但因他每次考试总分均居全班第一，也不便对他下禁令。次年高考，他不但达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还以 84 分的成绩（满分 100 分）获得全县语文单科第一名。那几年，观音垱中学连创高考佳绩，其中自有我的一份功劳。这也使得我这个“小字辈”在全县教育界有了名气。

严格说来，一个仅有高中学历的语文教师，是难以胜任高中阶段（尤其是毕业年级）的语文教学的。而我之所以能够创造佳绩，是因为我在文学上的积累已远远超出了原本不高的学历。我始终认为，一个缺乏文学修养或对文

学艺术情感淡薄的语文教师，即便有很高的学历，也是不称职的语文教师。而这样的语文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也往往凸显出刻板 and 僵化，很难产生吸引力。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相当多的学生对语文课不感兴趣，为什么语文教学费时多而收效甚微。

在我当上教师的第二年，就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于我们这些梦断“文革”的“老三届”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然而按照县内的“土政策”，从教未满两年的师范毕业生不得报考，我不得不死了这条心。以后，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逐年增加，我对此也失去了兴趣。

又过了两年，研究生招考也相继恢复，而且规定只要具备同等学历便可报名。我突然萌生了考研的念头，尽管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自量力。没想到校长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考研究生的请求。第一年恢复招收研究生的高校实在少得可怜，可供选择的专业也十分有限，有的还限制了外语语种。我填报的是汉语专业，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语法。尽管这并非我的爱好，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已顾不了那么多。

既要教学，又要考研，对于我来说，鱼和熊掌必须兼得。如果为了个人的前途而舍弃两个班的学生，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复习准备，除了吃饭、睡觉，业余时间几乎排得满满的。在必考科目中，难度最大的当属外语，虽然中学阶段学过俄语，但许多早已生疏。我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掌握了3000多个单词和基本语法，并自学了大学1~3年级的俄语教材。我以很快的速度读完了高等院校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学史等方面的教材（中学阶段的大量阅读使我的自学显得比较轻松），对每门课我都整理了一个复习提纲。正当我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并开始第二轮复习时，却遇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原来区文教干事担心我通过考研远走高飞，更担心我因复习备考而影响正常教学，而他又不便直接对我施压，便找到时任大队小学校长的我的女朋友的父亲（之所以不称为准岳父，是因为这次初恋后来以分手而告终），动员我放弃考研。考虑到自己并无十足的把握，也考虑到万一高考失利难以向学校交代，我只好听从劝告，中辍了半年多的努力。但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时，我收到了报考单位寄来的准考证。这再次诱发了我的欲望。我想，即便毫无希望，也不妨去试试，以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于是，我又偷偷地开始了复习。临考前一天，我以“想去试试”为由向校领导请假，

校长也许是出于怜悯，很快便同意了。可是我毕竟准备的时间太短，很多内容已来不及复习（政治这门公共课我只复习了三天，相关的教材只是浏览了一遍），只能仓促上阵。考完后虽觉得不理想，但也感到题目并不那么难。成绩公布后，果然如我所料，与专业相关的几门课都及了格，只是公共课（尤其是政治）分数偏低。

第一次考研的结果无疑使我信心大增，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冲刺。但也许是新任校长担心我会分散精力，并担心我的考研会在青年教师中产生“多米诺”效应，突然加强了“内部管理”，对办公制度也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我利用空余时间复习备考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此时的我已深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我铁下心来考研，对两个班的教学不可能没有影响，以学生的命运为代价来实现个人的愿望对我来说确实办不到（并非我的品德有多么崇高）。我不可能像其他考生那样享受请假复习的待遇（有的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与导师直接取得了联系），只能利用十分有限的时间进行准备。尽管我有了更多的知识积累，但终因精力有限未能很好地完成预订的复习计划，接下来的两次考试都功亏一篑。连续的失败使我对考研渐生倦意，我终于决定放弃，尽管我还能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很多人都为我感到惋惜，有人甚至说我是自己埋没了自己，但我并不认为几年的考研是白费气力。得与失是对立的统一体。对我来说，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遇，却因此而赚得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广泛的阅读，使我补回了“文革”中的许多损失，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复习备考期间，我不仅学完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还自修了《汉语史稿》等研究生教材。可以说，我在以后的语文教学中能应付裕如，与这几年的刻苦攻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时间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我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才倍感轻松，很顺利地拿到了本科文凭。

## 质疑专家——令我自得的美称

1983年秋，我被调往县办实验中学——郢都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如果说，我在观音垱中学只是雏鹰习飞，那么，在这所重点中学，我则逐渐练

丰了羽翼。我在语文教改的天空中穿云破雾，奋力翱翔。

在乡镇中学任教期间，由于手头没有一份语文刊物（那时几乎没有公开发行的语文刊物），也从未听说过“X步教学法”之类的教改模式，我的语文教学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顿时如获至宝，买下后便迫不及待地读起来。我很快便记住了于漪、陈仲梁、徐振维、高润华、陆继椿等人的大名，也深深地被他们的课堂教学艺术所吸引。但最使我佩服的还是上海市教育局语文教研员徐振维老师。她在教《我的叔叔于勒》时放手让学生质疑，组织学生讨论，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这样的课最见教师的文化功底和驾驭能力，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于是，我也把这种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没想到学生很感兴趣。从那时起，我的课堂教学就一直把质疑作为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也因此而变得愈加老练。在这里，诞生了我的第一篇教学论文《鼓起学生探究的风帆》（载《湖北教育》1981年第1期）。

调到郢都中学后，我更加深入地探索如何引导学生质疑，我已不满足于仿效徐振维老师的操作方式，我对质疑的理解已不再停留于“提出不懂的问题”这个层面。我认为，学与疑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它不应局限于某一个阶段，而应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这并不意味着让学生在上课时无休止地提问题，而是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问题，使认识走向深入。从形式上看，任何质疑都表现为对事物问一个“为什么”，但不同的问题乃产生于不同的探究方式，具有不同的价值。据此，我把它分为求解性质疑、推究性质疑、挑战性质疑、指瑕性质疑等方式。这几种方式呈梯级上升状态，但并不能简单地以此论其高下。教师的任务是教会学生提问题，并能根据问题的不同价值进行合理的课堂调控，恰当地安排教学进程。1989年，我将这一教学经验整理成《质疑方式初探》一文，参加全国中语学会和《语文学习》编辑部联合组织的论文评选，获湖北省优秀奖。以后，经过修改补充，又在《中学语文》1992年第4期刊登。

从那以后，在我的课堂教学中，质疑已成为家常便饭，我的学生提出的许多质疑不能不令我为之叹服。如我在教《扁鹊见蔡桓公》时，有个学生就提出：扁鹊初见蔡桓公时说“君有疾在腠理”，再见时却说“君之病在肌肤”，为什么前面用“疾”，后面改用“病”？我并没有急于解释，而是先问他们：